试论颜元的教育价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曲铁华,朱永坤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颜元生活在商品经济萌芽的明末清初,他一反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而提出既重义又重利的思想。针对宋明理学教育的空虚无物,他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从而他的教育也突出表现出工具性价值取向。颜元的教育价值思想比较全面,不但重视教育的理性价值,而且更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对颜元教育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颜元;教育价值;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5)01-0024-04

颜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是我国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教育家。颜元非常重视教育的价值,他不仅重视教育的理性价值,更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他提出了注重实学实用、以工具价值取向为主的教育价值论。这是自汉代以来,特别是宋明理学之后教育价值取向的一大进步。

一、颜元的教育价值思想分析

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1]。教育价值一般可分为工具价值和理性价值(或社会价值和本体价值)。教育的工具价值(社会价值)是指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发育有促进作用,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教育的理性价值(本体价值)是从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上讲的,人通过接受教育,在增长知识过程中发展人的理性,提高人的能力和文化素养,陶冶人的情操和美感。

颜元的教育价值取向,主要突出在其工具价值上,但他也较重视理性价值。他的教育工具价值是在对程朱理学的斗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主要以教育的理性价值取向为主。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主张以重义轻利、以克己复礼的伦理道德修养为主,培养“圣人”、“君子”和“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并对其作了补充和完善,使封建道德体系更加完

备和系统化。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教育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人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作为教育价值取向。魏晋以来,佛老肆行,清谈之风一度充塞社会和学校,玄学化的德性修养成为理想人格教育。自宋明以来,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官方学说,教育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修养取向更是变本加厉。这种以人性修养和封建伦理培养的理性价值取向,随明中叶西学东渐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而显得越来越与现实脱节。资本主义重“利”与封建道德中的重“义”形成矛盾,这种矛盾引起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各种新思想纷纷出现。一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们惩程朱理学及阳明心学之流弊,而开始转求经济实用之学,如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

朱熹的教育价值在于“变化气质”,采用方法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认为“理”和“性”是分开的,教育就是要使人的“性”符合客观存在的“理”。要想使人性符合天理,那就要灭人的欲望。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之;人欲胜,则天理灭。教育就在于“穷理”以自觉地灭人欲,把人引向一种近乎佛道的精神修炼上去。而他所提倡的“穷理”也不过是封建道德修养。颜元生活在明末清初,明朝的覆灭让他切身体会到被奉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毫无用处。他原先也信奉理学,但在为其养祖母服丧中,遵朱熹《家礼》而尽哀病殆,便觉有违性情,于是感到理学的那

收稿日期:2004-10-14

作者简介:曲铁华(1962-),女,辽宁铁岭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朱永坤(1978-),男,江苏镇江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一套不但毫无用处,反而害人,进而怀疑、批判理学,立志“矫枉救失”,从根本上转变“穷理居敬”、“静坐养性”为“实学”、“实行”。颜元24岁设家塾,一直到去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深谙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颜元充分发挥了教育的价值,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实才实德”的“经世”人才。

(一)教育的理性价值

教育的理性价值是用来增长学生知识、提高学生能力和素养的,任何教育都是培养人的教育,教育的理性价值不可或缺。颜元的教育理性价值,在于去人之引蔽习染,以恢复人的善性。他的教育理性价值是建立在对宋明理学批判基础之上的。

宋代理学把性分为两种:一种为义理之性(或曰天地之性),一种为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主张必须变化气质之性以恢复天地之善性。颜元则在理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反对程朱理学气质之性偏于恶的说法。颜元以“舍形则无性”的“形”、“性”统一观点,反对程朱的“气质之性恶”、“义理之性善”的“形”、“性”分离说,主张“形性不二”。在颜元看来,“形”是第一性,“性”是第二性的。他说:“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则无性矣,舍性则无形矣。失性者,据形求之;尽性者,于形尽之。”^{[2](P128)}没有形就无所谓性,形和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形”是“性”的基础,“性”是“形”的作用,这体现了他的唯物论思想。颜元认为世上并不存在天生就是善的“义理之性”,更不存在“气质之性恶”。他指出:“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2](P1)}这里“气质”的“气”就是指颜元所提的“形”,“义理”的“理”就是指“性”。若没有形体的存在,就不能反映精神现象的“理”,“若无气质,理将安附”。颜元从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方面有力地驳斥了程朱理学的人性论。

另外,颜元还从人的生理上驳斥了程朱。他认为“性”是“形”的机能,譬如人的眼睛,有“眶、眇、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2](P1)}。其他各种感官也如此。所以“性”就是耳、目、口、鼻、心的功能,至于性的功能大小,即才力的强弱,这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教育可使生来的素质“大其用”。“人性”是在人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指人的生理作用或机能。他认为“恶”与“善”一样,是人的后天道德行为,后天的道德行为所以有恶,是由于“引蔽习染”的结果。“其恶者,引蔽习染也”^{[2](P2)},也就是说,某些人的恶劣品质是由于外物引诱,人为之蔽,积习渐渍而成,它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颜元认为,每个人的“气质”虽各有“差等”,但都是“善”的,是各个人做人成才的本钱。并且认为“圣人变人也,其口鼻耳与人同”,“人须知圣人是

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2](P668)}。所以,应通过教育和学习,充分发挥自己“气质”的机能,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若因“引蔽习染”养成了恶习,经过教育是可以革除的。所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外染有深浅”,“习染重者,不易反也”。不易反不是不能反,不过其下功夫各有大小难易,只要努力学习和获得教育,终必“去其染着之尘污”。教育对人的理性价值,在于能够改正受外界影响的不良习性。

颜元还认为,人性虽然皆“善”,但各人的“气质”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他提出善有“第善”、“性有等差”的个性论。气质之偏,并非恶,而是各人有各人的特征。所以,所谓的“气质偏,而即命曰恶”是不对的。各人气质之不同,正是各人个性的基础,教育就应该根据学生的特长与个性来进行。他认为人是有所短的,不能任其自然发展,而必须加以教育补救。不过,他认为补救的办法,不是“变化气质”的本性,而是发展其本性。他说:“甚刚的人亦必有柔处,甚柔的人也必有刚处,只是偏任惯了;今加以学问之功,则吾本有之柔自会胜刚,本有之刚自会胜柔。”^{[2](P664)}即以教育为手段,用“学问之功”助短为长。个性和才能是否能获得充分发展,则要靠教育来实现,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理性价值。

(二)教育的工具价值

教育的工具价值也叫社会价值,指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颜元的教育工具价值取向的提出同样是建立在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之上,先破后立,形成了他实学实用性质的工具价值。

1. 教育的政治价值

颜元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价值,而政治价值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经世致用、有才有德的实用人才来作用于社会政治,以实现“大治”的太平社会。所以,颜元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对政治人才的培养功能。

颜元说:“朝廷,政事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2](P403)}人才是学校培养的,学校教育就关系到朝廷和政事。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颜元把学校与恢复“井田”制视为当时重要的两项工作,他对当时以理学为考试范围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极为不满。他说:“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2](P109)}“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2](P691)}。

颜元极力反对程朱理学之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造成了无数文弱书生。祸国害民,正所谓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贤知。这些理学培养出来的“白面书生”,只会静坐空谈心性,背诵经文,浪费时间,消耗人才,败坏风气,国将不治。理学产生于宋,它随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而出现,是宋时战乱情况下加强对人们统治的需要。然而

理学的静坐穷理终究没有使国家强盛,当国家危亡时,“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相之材”,而“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终于使宋偏安于江南。这时的南宋并没有能重新收拾河山,而是更加腐败,最终灭于元。明朝理学大兴,所培养出来空谈心性的白面书生更是难以经世济国。当清兵侵袭时,只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2](P51)}。腐朽的明心见性之学,无力扶危定倾,终于将明朝江山断送掉了。颜元亲历清兵入侵,明朝覆灭,究其原因,实为宋理之害。空言之害,浮文无用,“观诸宋明,深为可悲”。因此,他主张用学以致用的“实学”教育来代替毫无意义的“浮文”教育,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太平社会之理想。他说:“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实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2](P403-404)}教育是为国家培养既懂政治又懂经济,能为国家人民办事的官吏。他把学校和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的政治价值在颜元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教育成了“安天下”的重要工具。

2 教育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是指满足人们从事生产和再生产需要,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功能属性。颜元认为教育与经济关系紧密,主张教养并重,养先于教。他说:“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2](P104)}教可以推进生产以济养,而养也可从生产劳动中来推行教。“教”的价值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从而提高人们的生产水平,使人民大众富裕起来。而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有更大的实力来促进教育的发展。他所提倡的六德、六行、六艺教育内容,就是培养真才实才,以富天下、强天下和安天下。不过他还是主张先“养”后“教”的,这便是继承了孔子的“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得“预养”,“菲供膳,薄税敛,汰冗费,以足民食”,然后再进行“预教”,“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

颜元的教育经济价值,还可以从学校人才培养上看起来。颜元说:“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2](P398)}有人才者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他认为人才与政事是直接联系的,而政事则与国富民强、社会太平、人们能生活下去相联系,人才是治平大业的关键。颜元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第一,发展生产;第二,官民皆兵;第三,兴教育,办学校,举人才,达到“长治久安”。在他看来,国家富强、安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主要出于学校,所以学校教育乃富、强、安之本。

颜元从经济实用主义出发,主张学校应培养“圣贤”。他所说的“圣贤”是什么特征呢?就是“人必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 圣贤有两种:一是德才兼备的各级官

吏,二是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颜元认为,要想经世治平,仅有实才实德的“君相”和“百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百职”的专门人才,这些百职人才能够直接“生民办事”,发展社会经济。

颜元对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视,还反映在其教学内容上。他在肥乡主持漳南书院时,就设有“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实用科,以培养专门的经济人才。

二、颜元教育价值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注重教育的工具价值

颜元一反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而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在教育上便是实学实用的教育价值观。不可否认,教育是社会的一项事业,学校是社会中的一种机构,教育必须要与社会相联系。颜元在商品经济已萌芽的明末清初突出了教育的工具价值,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出现了高潮,继而出现了国家主义价值观,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更加强化了教育的工具价值作用。工业革命后,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被推到了社会的中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经济发展,教育的工具价值最大限度地显示出来了。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服务于社会是理所当然的。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许多发达国家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我国现阶段还比较落后,还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几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时代,其中又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为主,西部很多农村地区还没有脱贫,工业生产水平还不是很高,科技水平欠发达,人均生产总值还比较低,综合国力还不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工具价值更需要受到重视。我们应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作用,最大限度地培养科技人才,真正做到科教兴国,把我国推向现代化。

早在1995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就正式提出了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把科学和教育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也宣布了“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

知识贡献。这是面向 21 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得到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我国现阶段教育方针也显示出了教育的工具价值:“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已全面概括了教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价值。国情既是如此,我们必须加强教育服务社会的工具价值,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服务。

(二)教育的理性价值不容忽视

颜元在重视对教育工具价值的发挥时,并没有忽视其理性价值的作用。

我们在加强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教育工具价值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我国在加强教育工具价值时应避免的。

二战以后,科技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达,教育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教育在参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时,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之路,在科技、经济高度发展的背后带来的却是人们信仰的危机、精神家园的失落,人变成了一种工具而失去了人性的本真,这些正遭到来自西方社会的批评,强烈要求教育价值取向向理性价值转

变,呼唤教育培养人的理性价值。

21 世纪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中心任务。中国在全方位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教育的经济功能增强,科技理性被倡导,人力资源开发越演越烈。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将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升到很高的地位。社会发展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而人才的获得只有靠教育。教育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社会也给予其厚望和重托。然而,在强调教育社会功能和价值时,人们同时发现教育的本体价值被歪曲、践踏,科学理性凌驾于人文关怀之上,工具价值席卷整个教育领域。重新审视教育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上世纪末已出现的科学至上主义所造成的理性猖獗、情意缺失、人本沦丧、物性至尊等现象,呼唤“重估一切价值”(尼采语)。如何从异化的理性人、工具人、经济人回归为真正的人,这成为人们冥思苦想、大伤脑筋的一个难题,教育在解决这一难题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正处在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时期,中国教育价值取向如何,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大问题。我们在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时,切不可忽视教育的理性价值。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教育对社会和人的双重价值,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教育的这两种价值而不能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 王坤庆.论价值、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2] 颜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A tentative study of Yan Yuan's concept of educational values

QU Tie-hua, ZHU Yong-ku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Yan Yuan lives in the changing time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 when the commodity economy starts to emerge. While he is against the Confucian classic education of attending to loyalty more than to benefit, he favors the real learning or pragmatic education of putting equal attachment to both. All this shows his concept of educational values of tools, which is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his pragmatism-oriented education.

Key words: Yan Yuan; educational value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范玉凤]